研究動態

簡介近代亞洲的「賢妻良母」思想
—從回顧日本、韓國、中國的研究成果談起*

陳 妘 湲**

一、緒論

賢妻良母，若與賢夫良父並比公論，本無可厚非。然而傳統女教所欲培養與教育的賢妻良母，乃是男尊女卑前提下的賢妻良母，以此為終極角色的賢妻良母。而這「賢」與「良」，更是以女性為從、為卑所由制定和考量的「賢」、「良」，故其只能以貶損女性的獨立人格、壓抑女性的獨立地位為代價。就本質說，其實是以女性為犧牲的「賢」與「良」。所謂「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

* 本文承蒙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何淑宜小姐以及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候選人林聖智先生的大力潤筆，均在此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研究科博士課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義有愆，夫則薄之。故事夫如事天，與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班昭《女誡・夫婦》）。這便是賢妻的標準。「賢」至如此，則女性地位之可慘，也便無以復加。在這種「賢」、「良」要求下，女性生存的價值只是為人妻，只是為夫生子，只是相夫教子。總之，只是為其所依附之男性而生，為其所依附之男性而用，再無其他。以「三從」、「四德」的說教，使女子知「事夫如事天」，在此前提下爭效「賢」、「良」，努力作一個屈居從、卑而樂得其所，無怨無悔的賢妻良母，以實現其最高境界的人生價值，這便是傳統女教的目標。因而，這種賢妻良母的教育原則，便貫串於其始終，充斥於其內容。[1]

從上述這段文字，可以了解現在一般的言論如何認識「賢妻良母」這四個字。大致可以整理成以下兩點：其一，以「賢妻良母」爲「傳統」的婦女形象的基本內涵，或屬於「儒教」的婦女德目。其二，認爲「賢妻良母」違反近代之後的女權潮流。在此種見解之下，「賢妻良母」表徵著以「三從四德」與「相夫教子」爲代表的「中國傳統女教」。如果說「近代」與「傳統」是相對立的概念，那麼「賢妻良母」便與「近代」有著相當的距離。如果說儒教爲中國固有的文化，那麼屬於儒教文化內涵之一的「賢妻良母」，與「國外的影響」也有著相當距離。社會一般所了解的「賢妻良母」，就時間的坐標而言，似乎是「傳統」的文化多於「近代」的影響，就空間的坐標而言，似乎繼承中國「內在」的源流，更甚於「外來」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東北亞儒教文化圈內，均可見到類似「賢妻良母」、但又並不完全相同的詞彙，如現代日文的「良妻賢母」以及現代韓文中的「賢母良妻」。而且現代日文與韓文中對於這些詞彙的一般了解，也與中文的「賢妻良母」一樣，皆被視爲是傳統文化之遺產，並界定其根源在於形塑中國傳統文化的儒教思想。在共同繼承儒教文化的三國之中，這些「賢妻良母」、「賢母良妻」、「良妻賢母」的用語，未經過任何的考證而被

---

[1] 劉寧元主編，《中國女性史類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227-228。

視爲儒教婦女觀的中心，成爲舊時代傳統婦女觀之代名詞。[2]

本文首先探討儒教婦女思想與「賢妻良母」婦女觀的區別，以回答賢妻良母究竟是否爲中國傳統的女教。其次企圖探討賢妻良母的近代性。回顧近年來亞洲地區的相關研究成果，不僅中國文化，其他東北亞儒教文化圈國家，如韓國、日本也曾在經歷近代化的過程當中，出現「賢妻良母」之類的婦女形象。因此，我們可以說「賢妻良母」的婦女形象與其說是中國固有的「傳統」，不如說是近代以來時代要求下的產物。

二、「賢妻良母」的近代性

若將「賢妻良母」視爲中國傳統婦女形象之代名詞，很容易將之視爲儒教思想的延長，因此吾人經常會誤以爲儒教經典裡很早就有「賢妻良母」一詞。實際上在儒教經典中並不曾出現「賢妻良母」之類的詞彙。[3]「賢妻良母」之類的詞彙，不論日本、韓國或中國，皆是在其國家力圖進入近代，正摸索著脫離現狀的辦法之時，如日本爲明治維新以後，而中國以及韓國則要等到 1905 年前後，[4]始出現於文獻資料上。[5]

---

2 本文原則上以現代中文的「賢妻良母」爲其一般普通的名詞，而特別有必要限定其時代或地區時，則按照原來的用法，例如以「賢母良妻」或「良妻賢母」來進行討論。

3 「良妻」或「賢母」等用法，先秦時代就已經存在。例如《戰國策・趙策》有「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或《史記・魏世家》中有「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但是，將「良妻」與「賢母」連接的用法，《二十五史》以及《十三經》等古典裡，「賢妻良母」、「賢母良妻」或「良妻賢母」等皆不見記載。呂美頤，〈評中國近代關于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天津社會科學》1995-5（1995.9），頁73。參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4 據筆者所知，在日、韓、中文中出現最早的「賢妻良母」如下（由筆者中譯）。「女鑑は、貞操節義なる日本女子の特性を啓発し、以て世の良妻賢母たるものを育成するを主旨とする。」（女鑑的發刊宗旨爲，啓發日本女子的貞操與節義之特質，而養成爲良妻賢母。）《女鑑》1891年7月15日，頁6。另外劉肖雲曾指出，中村正直(1832-1891)曾在1872年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On Liberty*之日譯本《自由之理》中，就已用過「賢母良妻」之一詞。但是筆者未見此文。

那麼，此時「賢妻良母」的詞彙在文本中意味著什麼？或者說「賢妻良母」是在什麼樣的文脈之下開始被使用？東北亞將要進入近代世界的1900年前後，「賢妻良母」也隨著宣傳婦女教育的口號而在各國登場。當時，不論日本、韓國與中國都面臨如何加入近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時代課題，於是不論中國的維新派、日本的明治思想家、韓國的開化思想家，皆欲發動占全國人口一半的婦女參加這場競爭。他們批判舊式女教中的「女子無才便是德」之類的謬論，[6]提出「女學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

劉肖雲，〈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良妻賢母観の中日比較——その形成過程と内実〉，《山梨学院大学一般教育部論集》23（2001年）：彌爾，中村敬太郎譯，《自由之理》（出版地不詳：同人社，1872年。）

「華族及士庶女子를 募集하야 維新에 學問과 女工에 精藝와 婦德順哲을 教育하야 賢母良妻의 資質을 養成完備하야 出類拔萃에 共駕子文明之界하고 勸精進 就에不立子人隣之後하리니 此爲本塾之趣意也라.」（募集華族及士庶的女子們，教育維新之學問、女工之精藝以及婦德順哲，而養成完備賢母良妻之資質後，使她們出類拔萃地共駕於文明之界，勤精進就地不立於仁鄰之後。此爲本塾之宗旨也。）〈養閨義塾設立趣旨文〉，《大韓每日申報》，1906年5月9日。

「秦漢而降，宮闈之內，搢紳閥閱之家，女學時有存者，聖后賢妃，著述昭垂，大家尚宮，同符經傳，然已不遍逮於士族，安望其普及編户，爲國家擔鑄造國民之責任，盡賢母良妻之義務乎哉？」〈論女子教育爲興國之本〉，《順天時報》光緒31年7月13日。

5 在此必須先指出，「賢妻良母」、「良妻賢母」、「賢母良妻」等詞彙在各語言中的演變。雖然現代中日韓文中的詞彙，分別爲「賢妻良母」、「良妻賢母」、「賢母良妻」，但是最初的用語皆爲「賢母良妻」。其演變的時期以及過程皆不明，但是從目前研究成果來看，日文中的用法變爲「良妻賢母」始於1902年高等女學校令的宣布以後。其契機是當時菊地大麓等均使用「良妻賢母」一語來宣傳其國家所認定的女學宗旨。韓國以及中國最初出現的用語則與日本相同，爲「賢母良妻」，其後出現各種不同用語，例如「賢母良妻」、「良妻賢母」、「良母賢妻」等等。後來在韓文中以「賢母良妻」而固定下來，中文則經過1930年代的「婦女回家」論爭後，以「賢妻良母」的用語爲固定的用法。

6 近代以前，除了中國，韓國與日本也認爲婦女不應該求學，以下僅舉出日本與韓國各一例。「女子以成文盲爲善，女子以有才大爲害。」松平定信，〈修身錄〉，松平定信遺著、江間政発編，《楽翁公遺書》上（東京：八尾書店，1893），頁37。

「余家新婦入門之戒云：維考與敬，不待訓而知，吾言止於三，勤也儉也男女有別也，勤則不窮，儉則有節，古之教子，始於七歲而男女不同席，閨門之當嚴者，無過於此也，讀書強義，是丈夫事，婦人有朝夕寒暑之供，鬼神賓客之奉，奚暇對卷

國之所存者幸矣！」，[7]「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從不學始」，「欲強國，必由女學」[8]等主張，以「賢妻良母」爲女學的宗旨。在此一近代婦女教育論的脈絡之下，[9]「賢妻良母」的意義反而是在批判傳統的儒教婦女形象，「賢妻良母」所呈現的婦女形象，是受過教育並對國家有貢獻的最「新式」的婦女。

值得注意的是，「賢妻良母」與儒教的婦女觀的差異，一方面表現在教育宗旨上，另一方面也能從傳統社會中的各種女書中得知儒教婦女觀的詳細內容。如日本的《女訓抄》、《鑑草》、《女子訓》、《女大學寶箱》；中國的《女四書》；[10]韓國的昭惠王后（1437-1504）之《內訓》、[11]宋時烈

諷誦哉，多見婦人通古今說禮義者，未必躬行，而弊害無窮，東俗與中土不伴，凡文字之工，非致力不能，被非可責也，其小學內訓之屬，都是丈夫之任，宜默究而而知其說，隨事儆誨而已，若今閨壺，緩於黼織，而先務執卷則奚可哉。」李瀷(1681-1763)，〈婦女之教〉，李瀷，《星湖僿說》卷16。

7 鄭觀應，〈女教〉，《盛世危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88。

8 梁啟超，〈變法通義・論女學〉，《飲冰室文集》三（上海：中華書局，1926），頁38-40。

9 此種以國家富強為最終目的的婦女教育觀，在同時代的日本或韓國也可以見到。可以舉出以下的實例：
「如此，女子為生育男子之基本，豈非不從其根本而圖謀文明之基礎乎？東洋之所以微弱而不振興，是因為女子之無受教育。女子無識字豈能求其所生男子明澈乎？欲保全東洋之君主，皆應注意於女子教育。」〈女子教育論〉，《帝國新聞》1901年4月5日。
「凡文化之進退、風俗之隆污、種類之強弱及社會之興衰，皆有關係於女子。故，女子教育不僅為世界之精神，亦為一國之命脈。於今，清韓兩國，現世界新文化之風潮非不漸被，尚此開明進步，不勝遑遲，無他女子教育不立之緣故。」〈女學宜興論〉，《大韓每日新報》1905年12月8日。
「若要言女子教育所主眼，則在於養成性格與才能，以成為良妻與賢母，足以整理一家，薰陶子弟也。如無女子教育之宜，則無教育之鞏固。國家富強之根本，在於教育，而教育之根本則在於女子教育，勿可忘女子教育之興否則關係於國家之安否。」森有礼，〈中国地方学事巡視中の説示（1888）〉，木村匡編，《森先生伝》（東京：金港堂，1899），頁194。

10 《女四書》爲傳統中國社會教育婦女時所用的《女誡》、《內訓》、《女論語》、《女範捷錄》等四本書的總稱。此書在日本以及韓國皆做爲基本女書而通行，因此也可以說韓日中三國之傳統婦女觀有其類似的部分。

11 韓國最早以婦女爲對象的女教書，是由朝鮮第9代成宗之母昭惠王后，根據中國之

（1607-1689）之《戒女書》等，都是專門寫給婦女閱讀的書籍，其大概的內容爲講述婦女應遵守的德目，即「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通過與這些儒教女書所形塑的婦女形象相比較，可以更明白賢妻良母所表現的其實是近代婦女形象，而不是傳統儒教的婦女。

第一，儒教傳統婦女觀的基本原理爲陰陽觀，而「賢妻良母」的婦女觀則出於以近代人權思想爲基礎的平等觀。因此在「賢妻良母」的概念中，並不將婦女的地位置放在男性之下，男女之間的差異僅在於活動領域的不同而已。由此區別來看，雖然似乎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相同，但是在人人皆必須對國家有所貢獻的前提下，婦女扮演的「賢妻良母」之角色，也與男性同樣對國家富強有所貢獻。「賢妻良母」的角色，在以國家富強爲目的的近代平等觀之下，其內涵僅意味著男女分工，而並不包括任何性別歧視。

第二，比較在家庭內所扮演的角色，更明顯地看出兩者之間的差別。儒教的婦女觀較看重以上下秩序爲中心的媳婦或女兒的角色，而教導婦女成爲「孝婦」或「孝女」，此點也明顯地不同於賢妻良母的婦女觀。賢妻良母的婦女觀，則是基於由父母與子女而組成的近代小家庭爲構造的思想，此一婦女觀中並不存在孝順父母的德目。

如上所述，「賢妻良母」的概念，是以近代的時代背景爲前提，並積極批判傳統的儒教婦女觀。

表一 賢妻良母與儒教婦女觀的比較[12]

	儒教傳統婦女觀	賢妻良母婦女觀
基本原理	陰陽思想	近代平等思想

《烈女傳》、《明鑒》、《女教》、《小學》改編而成。由此書可以看出當時對於士大夫婦女的儒教理念之宣傳。

12 本表根據洪良姬，《日帝時期朝鮮의賢母良妻女性觀의研究》（漢城：漢陽大學校 史學科 碩士學位 論文，1997年）頁2而作成。據洪良姬所言，儒教傳統婦女觀與賢妻良母婦女觀之間，類似的德目尚有婦德、順從、貞淑、儉約以及勤勉等。

夫婦的角色	夫婦有別	天職論/天分論
媳婦的角色	重要性較大	重要性較減小
妻的角色	相夫	內助
母親的角色	生產>養育>教育	教育=養育>生產
女教之目的	教化	輸入知識
社會構造	王朝社會	國家社會
家庭構造	父母－夫婦－子女	夫婦－子女
道德	孝順	信義
理想的婦女像	孝婦/烈女	賢母/良妻

三、日本「良妻賢母」的研究

日本學界關於賢妻良母的研究，以深谷昌志 1966 年所發表的《良妻賢母主義的教育（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爲開端。此後從 70 年代起逐漸累積研究成果，雖然在一般日本人眼中的「良妻賢母」仍然是儒教文化中婦女形象之代名詞，但至少在學術界中，「良妻賢母」已不再代表傳統或儒教思想中的婦女形象，而被界定爲日本近代的婦女教育的目標。[13]

隨著近 40 年來的成果累積，日本史的研究方向開始多樣化。例如學者開始探討「良妻賢母」與其他西方女性思潮的比較、「良妻賢母主義」與近代日本的天皇制度或「國體觀念」之間的關係、在近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婦女進入勞動市場與「良妻賢母主義」的關聯等等。隨著目前研究的日益豐富，學者們的共同前提是把「良妻賢母」視爲近代特有的婦女觀念，否認其與儒教思想或傳統的關聯性。以下先列舉出研究史上較重要的成果，再闡述近來有關日本「良妻賢母」研究上的幾個論點。

---

[13] 舘かおる，〈良妻賢母〉，《女のイメージ（講座女性学1）》（東京：勁草書房，1984），頁184。

表二 有關日本良妻賢母研究目錄

發表時間	論文名稱
1966	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的教育（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名古屋：黎明書房，1966）。
1968	樋口恵子，〈賢母與良妻（賢母と良妻）〉，收入於田中壽美子編，《近代日本の女性像》（東京：社会思想社，1968）。
1978	関口礼子，〈從「賢母良妻」到「良妻賢母」－明治 28-31 年間的高等女學校論述（「賢母良妻」から「良妻賢母」へ—明治 28～31 年の高等女学校論）〉，《聖徳学園岐阜教育大学紀要》5（1978.7）。
1978	窪田祥宏，〈良妻賢母的教育思想之形成與其意義（良妻賢母教育思想の形成とその役割）〉，《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紀要》20（1978）。
1978	片野真佐子，〈良妻賢母主義的源流（良妻賢母主義の源流）〉，收入於近代女性史研究会編，《女たちの近代》（東京：柏書房，1978）。
1980	中嶌邦，〈明治前期的賢母論述（明治前期における賢母論）〉，收入於芳賀幸四郎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日本文化史研究 芳賀幸四郎先生古稀記念》（東京：笠間書院，1980）。
1980	久木幸男，〈良妻賢母的論爭（良妻賢母論争）〉，收入於久木幸男、鈴木英一、今野喜清編集，《日本教育論争史録第一巻》（東京：第一法規，1980）。
1982	ひろたまさき，〈文明開化與婦女解放論述（文明開化と女性解放論）〉，收入於女性史総合研究会編，《日本女性史　第四巻近代》（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
1982	永原和子，〈良妻賢母主義教育之下的「家庭」與職業（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における『家』と職業）〉，收入於女性史総合研究会編，《日本女性史 4》（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
1984	中嶌邦，〈女子教育的制度化－良妻賢母主義教育的成立與其評價（女子教育の体制化—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成立とその評価）〉，收入於「講座日本教育史」編集委員会編，《講座日本教育史 3》（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84）。
1984	舘かおる，〈良妻賢母（良妻賢母）〉，收入於女性学研究会編，《女のイメージ（講座女性学 1）》（東京：勁草書房，1984）。
1986	小山静子，〈良妻賢母主義的黎明－從女子用課本看賢母論的登場（良妻賢母主義の黎明—女子用往来本を通してみる賢母論の登場）〉，《女性学年報》7（1986.11）。
1988	吉見周子，〈良妻賢母主義的源流（良妻賢母主義の源流）〉，收入於吉見周子編，《日本女性史入門　講座女と家》（東京：同成社，1988）。

1989	瀨地山角、木原葉子，〈東亞的賢妻良母主義－從近代社會課題的觀點談起－(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良妻賢母主義—近代社会の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中国—文化と社会》4（1989）。
1990	石塚正英，〈良妻賢母的解說（良妻賢母主義の解明によせて）〉，《女性史研究》25（1990.12）。
1990	芳賀登，《良妻賢母論（良妻賢母論）》（東京：有山閣，1990）。
1991	小山静子，《良妻賢母的規範（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東京：勁草書房，1991）。
1993	氏原陽子，〈「母性」的概念－「良妻賢母」研究與女性主義的對話（「母性」の概念——「良妻賢母」研究とフェミニズムの対話）〉，《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教育学科》40-2（1993）。
1993	友野清文，〈良妻賢母思想的變遷與其評價－評介近年的研究（良妻賢母思想の変遷とその評価——近年の研究をめぐって)〉，《歷史評論》517（1993.5）。
1996	氏原陽子，〈有關良妻賢母的婦女形象－從明治期小學校修身教科書的分析（良妻賢母をめぐる女性像——明治期小学校修身教科書の分析から)〉，《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教育学科》43-1（1996）。
1999	中西直樹，〈明治後期的良妻賢母思想確立與體制化的過程（明治後期における体制的良妻賢母思想確立の過程）〉，《京都女子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紀要》12（1999.3）。
2000	牟田和恵，〈「良妻賢母」思想的表裏（「良妻賢母」思想の表裏)〉，收入於青木保ほか編，《近代日本文化論８ 女の文化》（東京：岩波書店，2000）。
2000	秋枝蘭子，〈「良妻賢母主義教育」的脫離與回收（「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逸脱と回収）〉，收入於奥田暁子編，《女と男の時空 日本女性史再考 10 関ぎ合う女と男 近代下》（東京：藤原書店，2000）。
2000	李卓，〈近代日本女性觀－良妻賢母論辨析〉，《日本學刊》2000-4（2000.7）。

第一，探討歐美思想之影響與「良妻賢母」思想之間的關係。自幕府末期至明治前後起出現一股留學歐美的潮流，中村正直、森有禮等明治前期的維新思想家也不例外，他們皆欲從歐美經驗找出日本近代化的捷徑。這些明治維新思想家的婦女論述，如中村正直的〈塑造善良的母親之論（善良ナル母ヲ造ル説）〉、[14]森有禮的〈妻妾論〉[15]等，都接受 19 世紀末維

[14] 中村正直，〈善良ナル母ヲ造ル説〉，《明六雜誌》33（1875年3月）。

[15] 森有禮，〈妻妾論〉，《明六雜誌》8（1874年5月）、11（1874年6月）、15（1874

多利亞時期的婦女形象，[16]認爲歐美社會的進步基礎在於教育兒女、管理家庭、協助丈夫的婦女，因而主張爲了國家富強，必須普及婦女教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明治維新思想家的婦女思想，已不將婦女的角色限於家庭內，而婦女教育也不僅提供家事之類的內容。他們皆站在平等、人權的觀念上，主張婦女教育應同於男性，以學習一般的教養以及自主的能力爲其目的。[17]深谷昌志的《良妻賢母的教育》、窪田祥宏的〈良妻賢母的教育思想之形成與其意義〉以及中嶌邦的〈明治前期的賢母論述〉等皆接受如上的看法，試圖顯示「良妻賢母」論述的近代史溯源。

第二，探討「良妻賢母」成爲日本天皇制度下之女子教育宗旨的過程，以及其與日本近代特有的「國體觀念」之間的關係。在探討明治時代成立的「良妻賢母」思想如何被教育制度吸收或變貌而成爲「良妻賢母主義」中，肯定日本近代的特殊性與否，是目前有關日本良妻賢母研究最大的爭論點。

從「賢妻良母主義教育」之名稱可知，明治維新思想家的「良妻賢母」思想，本身即具備與國家主義結合，並形成「主義」的可能性。1895 年 1 月通過的〈高等女學校規定〉[18]以及 1899 年 10 月發佈的〈高等女學校令〉[19]，在法律上正式確立了日本的女子高等教育制度。當時明治時期的日本正在建立以天皇制度爲主軸的「家族國家國體觀念」。「高等女學校」亦呼應此潮流，不僅加強了女子的修身教育，還增加家務、裁縫、手工等課程，以便使女子擁有足夠的能力維持「家庭」。因此，讓她們成爲「良妻賢母」

年8月）、20（1874年11月）、27（1875年2月）。

16 參見バンクス夫妻，河村貞枝訳，《ヴィクトリア時代の女たち》（東京：創文社，1980）。

17 中嶌邦，〈女子教育の体制化—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成立とその評価〉，收入於講座日本教育史編集委員會編，《講座日本教育史3》（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84年），頁115。

18 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名古屋：黎明書房，1966年），頁154。

19 〈高等女學校令〉1899年2月8日勅令第31號，三井爲友編，《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教育》（東京：ドメス出版，1977年），頁262-263。

爲教育的重要宗旨。[20]易言之，天皇制度下的「家庭」爲「國體」的最基本單位，此「家庭」由「良妻賢母」管理。也因此，「良妻賢母」的婦女觀與當時的家族國家觀結合而成爲「良妻賢母主義」。

學界對於「良妻賢母主義」的婦女教育是否爲日本近代特有的特徵仍有爭議。[21]強調「良妻賢母主義」與日本天皇制度之關係者，認爲這是日本近代僅有的現象提出這項看法的主要是深谷昌志的《良妻賢母主義的教育》與中嶌邦的〈女子教育的制度化－良妻賢母主義教育的成立與其評價〉等。另一方面，反對給「良妻賢母主義」賦予「天皇制國家主義」部分特性，而認爲「良妻賢母主義」是又近代的普遍思想的研究，也自 80 年代後期起開始登場，例如ひろたまさき的〈文明開化與婦女解放論述〉與小山靜子的《良妻賢母的規範》。其中在研究史上較被重視的小山靜子，不僅強調

---

20 其實旨大致是：「在日本所有的婦女們的命運已被決定成爲妻子與母親。但是這並不意味男子的地位高於女子。男女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存在，而男女皆各有其本分，因此必須明確區別以使男女守各自的本分。〈中略〉良好的家庭越多，其國則繁榮，不良的家庭越多，其國則衰落，可以說家庭爲一國之根本。〈中略〉在我國女子之職業並非是獨立事業，成爲良妻賢母是大多數婦女們的工作。因此所謂的女子教育應以使女子合乎此任務爲其宗旨。〈中略〉女子的天職在於成爲一家之主婦，盡良妻賢母的義務。女子教育，主要應該以使女子能達成此份天職的必要教育爲其主要內容。」（原文爲「日本では此の婦女子と云ふものは将来結婚して妻になり母になる者であると云ふことは女子の当然の身の成り行きであると云ふ様に極っ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しかしだからといって、男子の地位が高く、女子の地位が低いというのではない。男女は互いに相補助すべき者で、男子には其本分があり、女子には女子の本分があるから、各自区別を立てて互に自身の本分を守る様にして行きたいと思ふ〈中略〉善良なる家庭の多い邦は栄へ、不良なる家庭の多い国は衰ふ、即ち家庭は一国の根本である、〈中略〉我邦に於ては女子の職と云ふものは独立して事を執るのではない、結婚して良妻賢母となると云ふことが将来大多数の仕事であるから女子教育と云ふものは此の任に適せしむると云ふことを以て目的とせねばならぬのである、〈中略〉一家の主婦となって良妻賢母たる事が、即ち、女子の天職である、女子教育は主として此の天職を充たす為に必要なる教育を授くべきものである。」）菊地大麓，〈高等女学校長会議での演説（明治35年5月1日）〉，《教育時論》（明治35年5月5日）。

21 其爭論的介紹或批評，參見友野清文，〈良妻賢母思想の変遷とその評価——近年の研究をめぐって〉，《歷史評論》517（1993年5月）。

良妻賢母思想與近代西方思想有共同點，也同時指出「在現今社會也仍然存在期待於「良妻賢母」的狀況」，主張良妻賢母的思想不僅具有時間上的普遍性，而且具備空間上的普遍性。[22] 雖然在近代日本史上良妻賢母主義有不同的論述，不過他們皆同意「良妻賢母主義」一旦成爲日本婦女教育宗旨後，這項教育宗旨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23]

第三，從經濟的角度來探討「良妻賢母」思想出現的時代背景與條件的研究也出現，例如永原和子所著的〈良妻賢母主義教育之下的「家庭」與職業〉等。當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婦女們加入勞動市場時，相對於男性的「立身出世主義」，[24]「良妻賢母主義」則是針對女性。[25]此種分析顯示，近代理念的「良妻賢母」具有雙重性：良妻賢母一方面以建立近代女學爲口號，提供婦女們走出閨房進入社會或學校的機會；但另一方面，良妻賢母將婦女們的活動領域限於家庭內，壓抑婦女們進一步的社會活動，如職業活動或政治活動等等。

另外，近來良妻賢母的研究不僅深化理論方面的探討，還擴大研究範圍至其他亞洲地區。1989 年瀨地山角、木原葉子合著的〈東亞的賢妻良母主義——

---

[22] 友野清文，〈良妻賢母思想の変遷とその評価——近年の研究をめぐって〉，《歴史評論》517（1993年5月），頁58-59。

[23] 総合女性史研究会編，《史料にみる日本女性のあゆみ》（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頁144。

[24] 在日本傳統文化中，「立身出世」指社會上身分地位的上昇。本來「立身」來自儒教、而「出世」來自佛教的用語，到江户時代，武士階層與農民階層，分別以「立身」與「出世」來表達其對社會身分或階層上昇的願望。但是江户社會基於嚴格的身分制度，「立身」與「出世」皆不能夠突破當時身分秩序的壁壘。到了明治維新以後，當國家面臨近代化過程時，因需要廣泛地擴充人才，「立身出世主義」才被視爲理想的概念，作爲近代教育的宗旨而開始宣傳。例如1872年頒布的《就學告喻》。「立身出世主義」可以說是推動日本近代化的一個教育理念。參見竹内洋，〈立身出世主義の論理と機能——明治後期・大正前期を中心に〉，《教育社会学研究》31（1976年10月）；竹内洋，〈立身出世主義の系譜と論理——明治期を中心に〉，《関西大学社会学部紀要》7-1（1975年11月）。

[25] 參見永原和子，〈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における『家』と職業〉，收入於女性史総合研究会編，《日本女性史4》（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從近代社會課題的觀點談起——〉[26]可謂開其端。此研究使賢妻良母研究的視野擴大到整個東北亞儒教文化圈中，不僅提供日本良妻賢母研究一個比較的觀點，也帶動韓國及中國史方面的「賢母良妻」或「賢妻良母」的研究風潮。

瀨地山角與木原葉子的研究，注意到與日文的「良妻賢母」類似但並不完全相同的「賢母良妻」與「賢妻良母」，從分析詞彙演變的過程著手而指出：第一，東北亞儒教文化圈進入近代時，皆以「賢妻良母」爲新時代的婦女形象；第二，韓國及中國的賢妻良母思想皆是根據日本的「良妻賢母主義」而出發。

中國與韓國於 1995 年以後開始的賢妻良母之研究，可謂得之於瀨地山角、木原葉子的啓發，同時我們也要承認，韓國與中國關於賢妻良母的研究，多以中日或韓日比較史的觀點出發，研究方向與史料方面皆無法迴避日本良妻賢母研究的影響。特別是韓國史方面的研究，幾乎多被歸納於韓日關係史或殖民地時代史的領域之中。

四、韓國「賢母良妻」的研究

1990 年代後半期以賢母良妻爲題材的研究開始之前，在韓國，不論學界或一般社會，對於「賢母良妻」的了解亦如同日本或中國一般，皆誤解爲是「傳統儒教時代的女教概念」或「被封建制度壓迫的婦女形象」，例如：

> 大韓帝國時期的婦女教育論，先主張打破民眾對於婦女的舊時偏見，批判將婦女教育視為與一般國民教育有區別的特殊教育之觀點。他們皆主張，對於婦女教育的誤解，才是使國民教育目的不明，減少效果的根本原因。並強調首先果敢脫離賢母良妻之老套的婦女形象，而將婦女視為與男子同等的人格，賦予與男子同等

---

[26] 瀨地山角、木原葉子，〈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良妻賢母主義—近代社会の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中国—文化と社会》4（1989年）。又，本文改寫後收入於瀨地山角，《東アジアの家父長制：ジェンダーの比較社会学》（東京：勁草書房，1996年）。

的教育機會後，才能期待真正的國民啟蒙與國民發展。[27]

如上所言，早期的研究成果，皆以爲近代開辦女學的運動是爲了打破「賢母良妻」的傳統婦女形象，他們將賢母良妻視爲舊時代的思想，忽略了賢母良妻是在呈現「近代」的時代要求下所產生的概念。

表三 有關韓國賢母良妻研究目錄

發表時間	論文名稱
1997	洪良姬，《日帝時期朝鮮的賢母良妻之婦女觀(日帝時期朝鮮의賢母良妻女性觀의研究)（漢城：漢陽大學校史學科碩士 學位論文，1997 年）。
1999	川本綾，〈韓國與日本從開化期到 1940 年代前半期之賢母良妻思想，(韓國과 日本의賢母良妻思想，開化期로부터1940 年代前半)〉，收入於심영희、정진성、윤정로編，《母性的言說與現實：母之性、生、認同意識(母性 의談論과現實：어머니의性，삶， 正體性)》（漢 城：나남출판，1999 年）。
1999	川本綾，《朝鮮與日本的賢母良妻思想之比較研究－從開化期到 1940 年代前半(朝鮮과日本에서의賢母良妻思想에關한比較研究開化期로부터 1940 年代前半을 中心으로)》 （서울：서울大學校 社會學科 碩士學位 論文，1999 年）。
2000	洪良姬，〈韓國的賢母良妻論與塑造殖民地的國民（韓國：賢母良妻論과植民地 '國民'만들기）〉，《歷史批評》 52（2000 年）。
2000	신영숙，〈日治時期的賢母良妻論述與其實況研究（日帝時期 賢母良妻論과 그 實狀 研究）〉，《서울女子大學校 女性研究所 女性學論叢》14（2000 年）。
2000	김혜수,〈1950 年代韓國婦女的地位及賢母良妻論述（1950 年代韓國女性의地位와賢母良妻論）〉，《난곡이은순교수정년기념사학논문집》，（서울：논문집행위원회，2000 年）。

韓國史中有關「賢母良妻」的專題研究，以 1997 年洪良姬的《日帝時期朝鮮的賢母良妻之婦女觀》爲其開端，此文承繼了日本良妻賢母研究的成果，指出幾個重要論點：第一，透過與儒教女書中的婦女規範之細緻比較分析，推翻了以前的定論，證明「賢母良妻」概念不僅不同於儒教傳統婦女形象，更將賢母良妻重新界定爲近代思想。在此，洪良姬認爲韓國近

---

[27] 李崙禧，〈開化期言論을통해서본女性教育論〉，《白山學報》41(1993年)，頁223（原文為韓文，由筆者譯成中文）。

代史中所發現的「賢母良妻」論雖然是近代世界的普遍概念，但是仍然反應著韓國近代史的特殊性。在韓國近代史中，「賢母良妻」不僅代表近代對於婦女的要求，在殖民地時期更成爲日本帝國主義之婦女教育宗旨。如果說日本近代的良妻賢母主義之婦女教育是爲了確立天皇制度的家族國體觀念，那麼，屬於殖民地的韓國近代史中的良妻賢母主義之教育，則是被日本殖民主義者拿來當作統治手段罷了。洪良姬指出：

> 日本之所以將賢母良妻主義灌輸於殖民地的朝鮮婦女，可由以下二點加以說明。第一，日本殖民地主義者對朝鮮婦女普及賢母良妻教育，欲將其殖民地婦女們同化於日本帝國內的國民。傳統朝鮮的家族制度以孝順為至上的價值觀，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圖謀不同民族之間的結合，把此種朝鮮的傳統家族制度視為殖民統治最大的障礙。為了使朝鮮人忠於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先推翻朝鮮傳統的家族制度。第二，賢母良妻的婦女思想，另一方面扮演著對抗歐美思想的角色。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而言，從歐美流傳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是可能引發推翻殖民統治的危險思想。另一方面看來，普及賢母良妻的教育是為了對抗西方思想。[28]

洪良姬的研究雖然推翻先前一般學者對於「賢母良妻」的定論，而賦與「賢母良妻」「近代性」，但是似乎同時也將「賢母良妻」的性格定型爲日本殖民主義者所輸入的侵略策略之一。繼洪良姬之後有關賢母良妻的研究，皆以殖民地時代爲對象，站在殖民與被殖民或男性與女性的觀點來分析「賢母良妻」的形象。因此，其試論方向偏向於與日本的比較研究，如日本帝國主義者如何將同樣的「賢母良妻」的婦女教育宗旨運用於內地與殖民地，但也因此忽略了「賢母良妻」研究的其他可能性。

例如，川本綾的《朝鮮與日本的賢母良妻思想之比較研究－從開化期

---

[28] 洪良姬，《日帝時期朝鮮의賢母良妻女性觀의研究》（漢城：漢陽大學校史學科碩士學位論文，1997年），頁3（原文爲韓文，由筆者譯成中文）。

到 1940 年代前半》以 19 世紀末至 1940 年代的韓國與日本爲研究對象，從比較史的角度來分析兩國的「賢母良妻」思想。此文認爲賢母良妻思想並不完全是近代的時代產物，應界定爲同時具有傳統性與近代性的複合思想。隨著國家對於婦女的需求，調整賢母良妻思想中的傳統或近代色彩。從這一點出發，川本指出近代韓國與日本的賢母良妻思想發展的內容並不相同，是由殖民與被殖民者對於婦女們的不同需求所引起的。

> 賢母良妻思想，以從傳統社會中解放女子的束縛為手段，近代以後落實於韓國與日本。〈中略〉在1930、40年代日本的賢母良妻思想特別向「母性保護主義」的方向來發展，韓國卻並未見對母性的強調。從這一點可以知道賢母良妻思想的另一性格，即為殖民主義下的婦女政策。[29]

申榮淑的〈日治時期的賢母良妻論述與其實況研究〉，以韓國 1920、30 年代爲其研究對象，不僅是教育政策或制度面所表現的賢母良妻論，並進一步探討當時言論中所呈現的賢母良妻概念，文中指出：

> 第一，日本殖民地時代的韓國之賢母良妻論，幾乎以男性為中心而形成。第二，因國家積極推動賢母良妻論，紮根於婦女的深層意識，婦女自己也意識不到其思想中所隱藏的壓迫性。第三，受了當時進步婦女解放論的影響，賢母良妻論也遭遇一時的抵抗，但是殖民地時期後半賢母良妻論益加保守，深化了對婦女意識層面的控制。[30]

整體而言，韓國學界對賢母良妻之研究可以說仍處於初步的階段。不僅研究成果不足，研究對象偏向於殖民地時期，研究方向也集中於日韓比較史。因此，「賢母良妻」仍僅存在於殖民地時代的斷代史中而已，在整

---

[29] 川本綾，《朝鮮과日本에서의賢母良妻思想에關한比較研究開化期로부터1940年代前半을中心으로》（漢城：서울大學校社會學科碩士學位論文，1999年），頁62（原文爲韓文，由筆者譯成中文）。

[30] 신영숙，〈日帝時期賢母良妻論과그實狀研究〉，《서울女子大學校女性研究所女性學論叢》14（2000年），頁20。（原文爲韓文，由筆者譯成中文。）

個韓國婦女史中「賢母良妻」論是如何在言論、經濟、教育、法律等各方面產生影響，都有待今後進一步地探討。

五、中國「賢妻良母」的研究

近年來中國有關賢妻良母研究的方向可分爲兩種。一是較重視中國內在的因素，另外則是著眼於日本等外來思想的影響。前者認爲，「賢妻良母」思想來源於中國自古以來儒教之婦女規範，雖然其內涵在近代以後經過多次的轉變，但是招致轉變的因素，與其說是受到近代之後外來思想的影響，不如說是來自於中國社會的內在變動。

表四 有關中國賢妻良母研究目錄

發表時間	論文名稱
1995	呂美頤，〈評中國近代關于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天津社會科學》1995-5（1995 年 9 月）。
1997	姚毅，《近代中國的婦女理想形象之變遷（近代以後の中国における理想の女性像の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国際社会科学専攻修士学位論文，1997 年）。
1999	姚毅，〈中國的賢妻良母論述以及婦女觀的形成（中国に於ける賢妻良母言説と女性観の形成）〉，收入於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編，《論集中国女性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年）。
2000	池賢娥，〈通過北平市的中學男女分校令（1935 年）分析賢母良妻的教育（北平市의 中學男女分校令(1935 년) 實施를 통해 본 賢母良妻教育）〉，《東洋史學研究》72（2000 年 10 月）。
2001	劉麗威，〈淺議中國近代關于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婦女研究論叢》2001-3（2001 年 5 月）。
2001	劉肖雲，〈賢妻良母觀的中日比較－以政治理念的觀點看其形成過程與實況（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良妻賢母観の中日比較——その形成過程と内実）〉，《山梨学院大学一般教育部論集》23（2001 年）。
2001	林吉玲，〈中國賢妻良母內涵的歷史變遷〉，《社會科學輯刊》2001-04（2001 年 7 月）。

2002	李卓，〈近代中日女子教育的比較－「學」與「不學」的差異(学と不学のちがい——近代中日女子教育の比較)〉，《日本研究》24（2002 年 2 月）。
2002	胡澎，〈從賢妻良母到新女性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日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側面〉，未刊行，擬收錄於《日本學刊》2002-6（2002 年 11 月）

呂美頤的〈評中國近代關于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可謂中國賢妻良母研究的開端，也以重視中國內在因素以及歷史過程的角度來進行探討。此文也承認「賢妻良母」具有近代思想的面貌，但是仍強調「賢妻良母」源自於中國傳統。

此文認爲近代以後中國之「賢妻良母」概念，可追溯至中國先秦時代以來的「賢母」、「賢女」、「良母」等概念，在近代維新思想的影響之下被重新界定改造，被賦與了反映時代精神的新內涵而成爲新型的賢妻良母。

> 成為新型的賢妻良母，是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資產階級對女性新的要求，它不同於傳統的賢良主義之處在於以下三點，一是要求女性從為一個家庭而生存，變成為社會承擔一定的義務，為善種強國做貢獻；二是不惟酒食是義，要具有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具有相夫教子的能力；三是改變在家庭中為奴隸為工具的地位，變被動為主動，變消極為積極。[31]

此「新型賢妻良母」之概念，再次經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超賢妻良母主義」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的「婦女回家論」的兩次重大論爭，隨著當時社會內的經濟政治脈絡，或被當作塑造女性的最高標準，或被視爲阻礙婦女解放的謬論。

> 賢妻良母本身早已是一個落後於時代的概念。在歷史的變遷中，它已具有特定的文化內涵和時代的烙印。賢妻良母，基本上成為中國封建時代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塑造女性的模式。至於賢妻、良母兩詞，雖然其中包含了對中國婦女傳統美德的贊譽，但它畢竟是傳統文化的產物，其內涵中糟粕與精華並存。[32]

---

[31] 呂美頤，前引文，頁74。

[32] 呂美頤，前引文，頁79。

呂美頤之研究，以中國近代以後有關婦女問題的論爭爲分析領域，將中國之「賢妻良母」論分爲三個階段，即維新運動時期的「新型賢妻良母」、新文化運動中的「超賢妻良母主義」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賢良主義」，試圖分析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社會對婦女扮演的角色的要求。

林吉玲的〈中國賢妻良母內涵的歷史變遷〉，也可以說站在同樣觀點上，分析出中國歷史中所看到的「賢妻良母」的內容。但與前述呂美頤以近代之後爲探討對象的論文相較之下，本文將賢妻良母論分爲傳統時代的封建化女性形象、近代嬗變其內涵的「新賢妻良母」以及現代意義上的賢妻良母。但是，此文所稱呼的「賢妻良母」可以「家庭主婦」代替。也就是說本文與其說以文獻資料上出現的「賢妻良母」爲研究對象，不如說是在探討各個不同時代的婦女被社會所要求的抽象的家庭角色。

以上兩篇文章的研究方向，有兩點明顯地不同於日本或韓國方面的賢妻良母研究。第一，日本與韓國的研究，皆從探討婦女教育及其制度化的過程來處理「賢妻良母」的問題，但是以上兩篇則以言論上有關婦女之論爭爲其分析領域，將「賢妻良母」視爲婦女解放之「主義」的問題。第二，日本與韓國的研究認爲「賢妻良母」的概念淵源不在於傳統，而在於近代以後外來思想的衝擊，如日本維新時代的西方影響以及韓國的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但是如上兩篇則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因素中發現賢妻良母的源流，認爲雖然賢妻良母的概念在近代以後經過多次的轉變，但其概念源自於中國古代。

另外，姚毅〈中國的賢妻良母論述以及婦女觀的形成〉以及《近代中國的婦女理想形象之變遷》、劉肖雲〈賢妻良母觀的中日比較－以政治理念的觀點看其形成過程與實況〉、李卓〈近代中日女子教育的比較－「學」與「不學」的差異〉以及胡澎〈從賢妻良母到新女性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日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側面〉，則顯然受了日本研究成果的影響，不僅以中日比較史的觀點考察中國近代的「賢妻良母」形象，還將日本近代婦女史中的概念與理論模式延伸至中國近代史。

這些成果，如果與呂美頤或林吉玲之研究相比較，可以舉出以下的特點：第一，上述的研究都將「賢妻良母」界定爲近代以後從日本輸入的外來思想，[33]否認傳統思想或儒教思想的關聯。第二，它們主要探討的方向與日本的「良妻賢母」研究相同，討論中國的「賢妻良母」如何被選定爲由國家制定的女子教育宗旨，[34]以及如何呈現於教育內容中。第三，如果說呂美頤或林吉玲研究中所指出的「賢妻良母」實際上不僅意味著在近代所出現的某種婦女形象，而且也是婦女在各個時代所扮演的各種不同角色之統稱，這些研究中所稱呼的「賢妻良母」，則可謂以近代爲其時代背景的婦女形象。雖然兩者的用語相同，但是各自所指稱的概念則有明顯的差異。

以上所述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中的「賢妻良母」研究，雖然呈現出不同的歷史認識，但是可以確認兩者之間都具有共同的一面，即「賢妻良母」論正反映了「近代」的時代意識。

六、結論

整體而言，近代初期日本、韓國、中國皆處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如中國甲午戰爭後所面臨的亡國滅種的形勢等等。當國家面臨危機時，三個

---

33 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並無法支持其論證，僅能提出幾個旁證而已。例如，當初「賢妻良母」或「賢母良妻」之類的詞彙，或者被當時居住於中國的日本人使用，或在日本人所刊行的媒體上出現。姚毅，《近代以後の中国における理想の女性像の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国際社会科学専攻修士学位論文，1997年），頁19；瀬地山角，《東アジアの家父長制：ジェンダーの比較社会学》（東京：勁草書房，1996年），頁133。

34 光緒三十三年所頒布的〈學部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摺附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中云「女子教育，爲國民教育之根基。故凡學堂教育必有最良善之家庭教育以爲補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之良善，端賴賢母。欲求賢母，須有完全之女學。凡爲女子師範教習者，務於此旨體認眞切，教導不怠。」在中國女子教育史上，此文被認爲是賢妻良母主義之開端。〈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折（附章程）〉，《東方雜誌》4-4（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國家都奮起救亡圖存，但在深感力量單薄的情況下，開始鼓勵占人口一半的婦女也參加這場挽救國家的歷史過程。亞洲三國的「賢妻良母」論述，雖然內容與發展過程不同，但其淵源可說皆來自此種近代國家危機的形勢。通觀日本「良妻賢母」、韓國「賢母良妻」以及中國「賢妻良母」的研究，可以歸納出雖然不同的國家情勢帶來不同的「賢妻良母」之內容，但是「賢妻良母」概念的本質正在於其「近代」的時代要求。

在各國歷史進程中實現的「賢妻良母」論之面貌，反映出中、韓、日所面臨的各自獨特的時代問題，如韓國被殖民的情況或日本之帝國主義路線等。由於三國各有不同的特殊因素，也產生不同賢妻良母的內容。換句話說，分析近代三國間的「賢妻良母」論的意義，不僅止於婦女史研究，同時也在於提出能通觀亞洲近代史的另一個切入點。通觀以「賢妻良母」爲主題的各國歷史研究中的不同方向，不僅是由於各國歷史進程的不同所造成，也因爲歷史研究必須呼應其各自的歷史觀。「賢妻良母」研究的另一個意義，或許也有助於釐清亞洲各國在近代以後所形成的不同歷史觀。